



英国学派译丛

刘德斌 主编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社会的演进



[英] 亚当·沃森 (Adam Watson) / 著 周桂银 王黎 陈曦 任慕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英国学派译丛

刘德斌 主编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社会的演进

[英] 亚当·沃森 (Adam Watson) / 著 周桂银 王黎 陈曦 任慕 / 译

图字：01-2015-6070 号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by Adam Watson

Copyright©1992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n imprin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 Affairs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社会的演进 / (英) 亚当·沃森著 ; 周桂银 , 王黎 , 陈曦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19.1

(英国学派理论译从 / 刘德斌主编)

书名原文 :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BN 978-7-5012-5933-5

I . ①国… II . ①亚… ②周… ③王… ④陈… III . ①国际关系史 IV . ①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8571 号

书 名

国际社会的演进

Guoji Shehui de Yanjin

作 者

[英] 亚当·沃森

译 者

周桂银 王 黎 陈 曦 任 慕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责任出版

赵 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电 话

010-85112689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部) 010-85119023 (邮购电话)

网 址

www.ishizhi.cn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00 × 1000 毫米 1/16 26.5 印张

版次印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933-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09 年 重 印 本 导 言

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①

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在 1992 年首次出版，但是，他希望完成一部探讨国际社会历史演进的著作的想法却由来已久。实际上，这本书最初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沃森的计划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对于历史上的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没有一定的把握，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沃森之所以能够认识到这个深刻见解的重要意义，一部分是源于他对于自身作为外交官的经历所进行的反思，一部分又是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以下简称英国委员会）。英国委员会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兼容并包地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学者和实践家。他们希望通过举行讨论会，不断推动对于国际关系的更加深入和更有洞见的理解。他们深思熟虑的观念基础和前进动力在于他们全体一致地认为，不仅有必要借鉴历史和理论，而且还必须融合历史和理论。英国委员会的讨论会活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告终结，但是委员会所提出和传播的思想对于英国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研究都产生了经久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英国委员会与许多颇为重要的著作和许多影响非凡的学者密切相关；其二，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原创性思想为后来的闻名遐迩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不管人们如何

^① 我们谨对亚当·沃森和安迪·沃森在我们开始动笔撰写这个导言时所给予的大力襄助表示感谢。2007 年，亚当依照往年惯例回到英国，我们原本打算在此期间面晤讨教，但他返国即罹病住院，并迅即陷入无法康复状态。即使如此，他仍决意践行诺言，答允我们提出问题清单，并由安迪充当我们之间的传言人。在多年的交往和相知的过程中，我们与安迪和亚当之间做到完全尊重和无比敬爱，因此，我们满心期望这个导言不失公允地展现出亚当的生平和著作。

评价这个学派——奠定了基础。^①

《国际社会的演进》成书于英国委员会解散若干年之后，但在这个导言里想要指出，不仅要將本书看作是国际关系研究演进过程的一部绝对重要的文本，而且还要认识到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英国委员会的努力和路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试图挑战蒂姆·邓恩和布鲁尼洛·韦格齐的观点，而这两位学者对英国委员会的努力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研究。邓恩认为，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代表了英国委员会研究活动的“最高顶点”；韦格齐指出，1984年出版的这本著作是英国委员会“最系统和最有条理的成果”。^②我们无意贬低这部较早时期出版的著作的重要地位，但我们想要指出，邓恩和韦格齐对该书如此评价，乃是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沃森的这部稍后出版的著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就忽视了后者与英国委员会的长期争论和诸多关切之间的有机联系。

沃森不仅是英国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是委员会的四任主席之一。他把《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题献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另外三任主席，即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极为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委员会的深切情意。《外交探究》是一部由英国委员会编辑的、体现其创立阶段工作会议成果的文集，在这本著作声誉鹊起之后，委员会打算推出第二本集体著作，[ix] 它将聚焦于委员会的以下志趣，即“发掘那些曾经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相提并论”。^③ 1965年，

① 关于英国委员会与英国学派之间关系的一项讨论，参见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m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参见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p. xiv 以及 Brunello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4–1985): The Rediscovery of History*, Milan: Edizioni Unicopoli Srl, 2005, p.86。伊安·哈维译自意大利语。

③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Historic States–system”, 提交给1965年1月举行的英国委员会会议的论文，引自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70。英国委员会的第一部集体著作是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布尔起草了关于这项研究的一个著作提纲，他把这个提纲呈交给委员会并随即得到接受。^①两年后，这个提纲初稿又在委员会内部传阅了一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还有人认为这本文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版面世。但在1971年中期，马丁·怀特这时已接替巴特菲尔德成为委员会主席，他同意“放弃这个宏伟却不切实际的计划”。^②

在这个转折关头，沃森首先提出由他一个人独自承担这个计划。他的如此雄心并没有让介绍他加入英国委员会的巴特菲尔德感到丝毫的惊讶，这部分是因为沃森是他当年教过的最才华横溢的历史系学生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沃森的实践经历。1960年初，当沃森加入英国委员会时，他已经是外交部的一位很有名气的官员，他曾在冷战时代的英美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只不过他的功绩到现在才逐渐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是，在他加入英国委员会之时，他正全身心地投入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这段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国际关系观。正如巴特菲尔德在一封写给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米勒的信中所提到：“近年来作为大使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各种最新事态的实践经历，使得沃森能够从一个更广更新的角度去审视国家体系的现实存在这样一个事物。”^③

在沃森决定承担这样一个从世界历史视角去全面考察国家体系的计划时，包括沃森本人在内的英国委员会的成员正忙着撰写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国家体系的论文。但是，沃森自己清楚，他的著作不会囿于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观点。正如他在提交给委员会的一份研究计划书中所说，尽管

① 草稿重刊于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408。

② 引自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72。

③ 信件日期标为1971年1月6日，引自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73。这里有一个关于专门术语的问题。正如我们即将展现的那样，此时英国委员会受到来自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学家阿诺德·赫尔曼·赫伦（1760—1842年）的影响，拿破仑战争期间，他撰写了《欧洲国家体系史》。该书译成英文时却采用了《欧洲及其殖民地政治体系史》之名，虽然在正文中将德文“staatensystems”一词译为英文“states-systems”（国家体系）。赫伦认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是由两个国家体系构成的。然而，正如下文即将讨论的那样，对英国委员会的成员来说，国家体系的概念包含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这两个概念。

人们始终会认为他的这本著作“将是经过英国委员会深思熟虑审议之后的产物”，但同样也应当承认，这本书将会展现沃森本人的观点，所以，他当然不会成为委员会讨论活动的“报告人”，或者受到这些讨论的任何“限制”。^① 韦格齐强调指出，在这个转折关头，“沃森的思路与英国委员会的一贯做法存在着差异”。这个评论毫无疑问地解释了韦格齐当时所断言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的重要性，而这本书最终成为英国委员会集体完成的第二部文集，并且实际上也是最后一部文集。^② 虽然韦格齐提及《国际社会的演进》，然而他没有像对待《国际社会的扩展》那样深入细致地分析沃森的著作。但在我们看来，沃森的这本著作也受到他与英国委员会的密切联系的深刻影响，所以，这本著作也值得使用韦格齐拿来深入分析《国际社会的扩展》的那个相同的思想透镜来进行考察。

这个导言的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沃森作为外交官和学者的卓越生涯。我们如此安排，首先在于这样做有助于人们了解这本著作背后的那个作者，但其次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外交官经历也深刻影响到他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式。然后，导言第二部分先是借用韦格齐的分析，以强调英国委员会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基本特征，由此支起一面透镜，我们可以从中检验《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到底是偏离还是进一步发展了英国委员会的总体志趣。

亚当·沃森：从实践者到理论家

英国委员会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它冀望把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方法及睿见汇聚于一体。然而，这个想法并不是要把实践者当作信息来源，从而使得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运用这些信息去推动关于国际关系的比较理论化的理解。同样，英国委员会也无意非要弄出一套具有政策含义的理论模型。相反，委员会从一

① Adam Watson, “Adam Watson’s Book on System of States”, 提交给1972年9月举行的英国委员会会议的论文，引自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242。

② Vigezzi, *The British Committee*, p. 72.

开始就坚持认为,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经常举行讨论会可能会带来一种协同效应,而如果这些讨论只限于学者,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委员会内部普遍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所以吸纳那些志趣相投的实践者加入其中是一个明智之举。沃森毫无疑问正是这样一位实践家。正如他在耄耋之年所撰述的一部著作中所写道,他终其一生的工作,始终是关注“国家间关系的实践和理论”。^①虽然沃森并非委员会的唯一实践者,但他却是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一位。此外,正如他的生平细节所展现的那样,虽然沃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折期,但他还是完成了转变,在经过几乎四十年的外交实践之后,他开始了第二个同样成功的职业生涯,成为一个极其成熟的学者,而他的主要关切是从理论出发去理解国际关系实践。

约翰·休·沃森(1914—200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出生于英国莱斯特,但他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贸易公司。^②他先后就读于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大学,1937年进入英国外交部门,随后在1939年被派往英国驻布加勒斯特使馆工作。1940年,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集团,英国政府遂断绝与罗马尼亚的外交关系,沃森是最后一个离开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官员。他后来写道,他“锁上了门,带走了钥匙”。^③英国外交部随后将他调到开罗,成为英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联络官,当时,自由法国正参与西部沙漠战役的行动。1942年,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以致沃森接到以下一项任务,一旦英军在阿拉曼战败,他将负责埃及向德

① 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xi.

② 沃森进入外交部时取用了“亚当”一名,因为当时外交系统名叫“约翰”的人太多了。

③ 朱莉·邦克和迈克尔·福勒在其撰写的《政治科学》杂志的沃森悼词中提到了这个故事,见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1(1), 2008, pp230-1. 在布加勒斯特期间,沃森与小说家奥利维娅·曼宁及其丈夫雷吉·史密斯建立起亲密友谊,后者在英国领事馆做一些教学工作。曼宁撰写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地方的英国侨界的多部小说,在《战争厄运》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是以沃森为原型的。雷吉·史密斯后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制作人,出品了沃森撰写的四部戏剧。

国军队的投降事宜。庆幸的是，沃森后来无须执行这项任务。此后，他继续努力地维持英国与自由法国之间龃龉不断的关系。

1944年，在战争临近结束之际，沃森又被转派到莫斯科，在这里他与乔治·凯南结下了终生友谊。^①他还同沃尔特·毕代尔·史密斯和约翰·佩顿·戴维斯建立起亲密联系。史密斯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后来在1950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斯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他后来的外交职业生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关于国务院藏匿着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的臭名昭著的指责而被迫中断。^②在俄国期间，沃森曾见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碰巧担任过丘吉尔的俄文翻译。四年任期结束之后，他在1948年被召回外交部，进入情报研究局（IRD）工作，该局由拉尔夫·默里爵士在1948年1月开始担任第一任局长。据桑德斯研究，这个新成立的、看似不起眼的机构，成为当时英国外交部内发展最快的部门，其职能任务是针对苏联宣传进行反宣传。^③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希望向前再跨进一步，他坚持认为，“拿出一个可以跟共产主义相抗衡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④然而，只有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个领域的冷战才得到了深入细致而持续不断的研究，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沃森在冷战历史上的重要性才开始变得愈益显著。事实上，英国是第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宣传而制订全球协调政策的国家。^⑤英国政府认为，采取积极而主动的

① 当时，凯南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二把手。在这个位置上，他发回了后来众所周知的“长电报”（长达5300字），提出了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因，从而奠定了未来四十年期间美国政策的基础。

② 戴维斯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发生冲突，因为他预见到中国共产党将会打败国民党，而美国应据此与毛泽东展开对话，而且这样做实属必要。从1948年到1954年，他的忠诚问题屡遭拷问，虽然各种指责无一证实，但他最后还是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解职。经过长期抗争之后，戴维斯终于在1969年得到平反。

③ Frances Stone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 58.

④ 引自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p. 58.

⑤ 参见 Andrew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1945-1953: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战略对抗共产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沃森后来所承认，这种战略并不是直截了当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斯大林的正面形象，“当时的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消除战争期间形成的和蔼可亲的老乔大叔这样一个神话”。^①

由于情报研究局活动的秘密性、极端的反共主义立场以及对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渗透性，它始终面临着诸多责难。^②但是，正如威尔福德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早期阶段，情报研究局与工党政府以及工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例如，他指出了沃森和时任英国工党总部国际书记丹尼斯·希利之间的密切的合作和友谊。^③同样，德夫蒂认为，希利是情报研究局与工党之间的主要联络渠道，希望通过希利之手将“情报研究局的材料散发到他在欧洲各地的左派联系人那里”。^④所以，从一开始，英国的目标就在于试图影响精英舆论，特别是左翼精英舆论，鼓励他们去传播一种反共主义方针。据沃森后来说，他之所以被要求加入情报研究局，部分原因在于他“与左翼文学界的许多头面人物保持着友好关系”。^⑤

1949年中期，沃森担任拉尔夫·默里的助手，因而很快就成为局里的核心

① 引自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pp.58-59.

② Hugh Wilfo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Britain's Secret Cold War Weapon Reveal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1998, 353-369. 在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Calling the Tune?* London: Frank Cass, 2003 一书中，威尔福德对于研究局及其在这个时期的工作都做出了公正的评价。1977年，戴维·欧文担任外交大臣时，最终解散了这个研究局。

③ Wilfo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p. 362. 丹尼斯·希利终于跻身于工党高层，虽然他最后未能成为党魁，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担任国防大臣长达六年之久，并在1974年至1979年期间再次担任财政大臣。

④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p. 248.

⑤ 引自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p. 87. 这层关系的最有争议的后果也许是沃森决定向乔治·奥威尔索要一份共产党同情者的名单，而无巧不巧，这份名单的争议性非同小可。关于这个事件的公允评价，参见 Timothy Carton Ash, "Remembering George Orwel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0(14), 25 September 2003, <http://home.planet.nl/~boe00905/OrwellNYreview250903.html>, 2008年11月11日访问。

人物。例如，这一年10月，当美国国务院建议英美两国就反共宣传交换立场时，大家一致认为沃森应该代表英国前往华盛顿。然而，据威尔福德研究称，英国外交部对于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工作知之甚少；他进而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更多的经验“以及经常流露出来的智力优越感，使得英国方面认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有着一种天然的优势”。^①沃森并不认可这种看法。他稍后不久发现：“我们非常轻率地向美国人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通常是善意的，即使不是忠言，美方也将其视为一种有益的外部看法而迅速加以接受。而我们对于美国方面的建议却表现出极度的自以为是。”^②在1950年1月华盛顿之行期间，沃森并未投宿旅馆，而是同他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所结交的那些美国朋友朝夕相处在一起。^③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双方很快同意，英美两国互派情报联络官，以推动协调两国在宣传领域的政策或美国人当时所说的心理战。^④

1950年8月，沃森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的首任情报联络官，此后他在这个岗位上长达六年之久。他到任后不到一年，他的工作就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在伦敦的美国情报联络官尸位素餐而毫无作为，但又未被免职，结果，沃森成为他对英国外交部所说的“中间人，努力寻找两国在各个不同领域进行合作所能带来的好处”。^⑤在此期间，沃森巩固了与美国各界重要官员的极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沃森与美国负责心理战的共和党官员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一如前任杜鲁门总统在职时期那样。因此，沃森确保了英美两国在宣传战和心理战方面进行密切合作，一如两国在情报领域的合作那样。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情报合作构成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核心，但随着档案的不

① Wilford,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p. 71.

② 引自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p. 214.

③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p. 156.

④ 关于当今时代所讨论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一项简要概括与评价，参见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 2008, 94–109.

⑤ 引自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p. 157.

断公开，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在冷战初期阶段，心理战方面的合作也同样重要。德夫蒂指出，沃森似乎“体现了英美特殊关系”，因而是“英美反共宣传合作的关键人物”。事实上，正如威尔福德进一步披露并坚持认为的那样，沃森的重要作用，即“冷战时期英美关系的关键人物的事实，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外交史学家的重视”。^①

然而，这个评价遗漏了以下事实，即沃森在华盛顿任职期间，美国毅然决定与整个欧洲地区特别是英国建立起同盟关系。美国正逐步确立领导者或霸权国地位。美国未能发挥其驻伦敦情报联络官职责一事，不过是美国与盟国之间关系并非双向对等的诸多体现之一。正如沃森在五十年之后所指出，人们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形势的视角，必须是“一系列同心圆，而美国则戴着帝国斗篷，站在正中央的位置”。^②他坚持认为，这个比喻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比较复杂的现实情况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看法不可能不来源于他对于时局的观察：英国在明确了必须在宣传上对苏联做出回击之后，接着就被要求奉行美国所青睐的那种政策路线。毋庸置疑，霸权将成为沃森后来的国际关系思想中的一个绝对重要的观念。

1956年，沃森从美国返回英国，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他深度参与了如何应对欧洲权势在非洲受到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非洲大陆的非殖民化复杂进程的任务。但是，就迄今为止所能发掘的资料而言，他在非洲事务上的作用始终未能得到外交史学家的系统探究。现在所能掌握的纯粹是他的任职情况。1959年他担任驻巴黎总领事，负责指导英国与法属非洲殖

① Wilford,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p. 72. 1950年，沃森与美国人卡特琳·安妮·坎贝尔喜结连理，从而加强了他与美国的联系。我们都称沃森夫人为安迪。他从莫斯科返回后不久遇到了安迪，当时她是在伦敦任职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她帮助沃森扩大了美国交友圈，例如，向他引荐了林登·贝·约翰逊的心腹之交艾贝·福塔斯。约翰逊成为总统后，提名福塔斯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通过这层关系，沃森也建立起他与约翰逊的联系。

② Adam Watson, *Hegemony an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93. 这句话引自沃森200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

[xiii] 民地的关系。在随后的三年里，他担任英国驻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多哥的大使。^① 大使馆设在塞内加尔，而他自己则是一个四处巡视的大使，他的职责包括拜会新独立非洲国家的过渡领导人，说明他们可以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取哪些援助。除了法国的前属殖民地以外，他还先后访问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前属殖民地，以形成一种比较性的观照。^② 沃森与非洲的接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利用在剑桥大学的一年学术休假时间，根据他自身经历撰写了一本著作，评估了非洲的未来前景，虽然只是聚焦于热带非洲地区尤其是西非地区。然而，由于外交部官员对该书部分内容持有保留意见，所以沃森不得不用笔名出版这部著作。《新兴的非洲》一书是以“西庇阿”之名出版问世的。^③

这部著作所提供的是一项关于非洲及其非殖民化过程的充满同情心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是根据他与非洲大陆的亲密接触。虽然他认为殖民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他又承认这种发展付出了“温室”经济体不期而至的代价，后者愈益以满足宗主国的需求为旨向。^④ 但同样地，他进而争辩说，尽管非洲经济遭到西方的严重扭曲，连非洲领导人自己也承认，“殖民统治确实不公正和令人羞辱，但它却不是非洲落后的根本原因”。^⑤ 非洲受到“几乎每一种经济资源的极度短缺”的束缚，而沃森认识到，这些短缺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在缺少大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是无法克服的。^⑥ 但是，他还强调指出热带非洲地区的殖民历史并不漫长，并认为“真正而深刻的变化”也只是发生在最近四十年。^⑦ 然而，真正让外交部官员感到头痛的不可能是沃森的殖民化的观点。他们更可能关心的是沃森所坦率承认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新兴非洲国家的统治者及

① <http://ukinsenegal.fco.gov.uk/en/our-office-in-senegal/our-ambassador/previousambassadors>.

② 参见 Watson, *Limits of Independence*, p. xv.

③ Scipio (J.H. Watson), *Emergent Afric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5.

④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44.

⑤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67.

⑥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79.

⑦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28.

其拥趸者意欲久居高位，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他们的妻子，意欲享受安逸快乐的生活”。^①沃森进而认为，一个更大的危险是“政党寡头政治的持久性”。^②尽管存在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和危险，沃森还是表达了他对于非洲未来的乐观情绪。此外，他也同情非洲领导人的看法，如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的看法，后者认为，如果非洲自身的文化价值得到发展而不是扭曲，那么，黑种人的特质“就会为世界文明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③

《新兴的非洲》出版三年以后，沃森以实名发表了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他在这些讲座中承认，非殖民化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维持海外殖民地“在道德上并不是那么正当”。^④他敏锐地看到了整个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追求独立的迫切愿望。不过，他坚持认为，欧洲殖民主义的活跃时期极为短暂，前后还不到五十年；这个短暂的阶段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概括殖民化以前和以后的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的性质。尤其是，正如他在晚年反思后殖民关系那样，他发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关系是否代表了帝国主义或霸权。^⑤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国际社会的复杂而多样的政治关系性质成为他的一个研究重心。事实上，他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取名为《霸权和历史》。

这个中心思想将在他的下一个任职期间再次浮出水面。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沃森被派往古巴担任英国大使，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之久。他思考了古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性质，特别是这个岛国从交好美国转向结交苏联

①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114.

②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117. 他通过引用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米洛万·吉拉斯（密洛凡·德热拉斯）的著作来强调这个观点。吉拉斯认为，东欧地区的共产党已经确立起特权，少数党员享受着这些特权，而这些人被他称为“新阶级”。

③ Scipio, *Emergent Africa*, p. 38.

④ Adam Watson, *The Nature and Problems of the Third World*, Claremont, CA: The Claremont Collages, 1968, p. 8.

⑤ Watson, *Limits of Independence*, p. xv.

的后果，并引用了一句奴隶谚语：“换了主人并不意味着获得自由。”^①所以，在沃森看来，在主权平等的意义上来概括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把握当代国际社会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1966年到1968年，沃森度过了他在英国外交部的最后几年。期间，他在伦敦担任负责北约事务的副国务大臣。之后，他从外交部提前退休。但在此后五年里，他又继续担任新组建的英国莱兰汽车公司的外交顾问。这段经历到头来是令人沮丧的，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陷入了公司与以色列的一场争端当中，当时，公司内部正讨论向阿拉伯国家出售路虎汽车的问题。

在作为实践者的最后几年期间，沃森重新挑起了影响东西方关系和欧美关系的重任。1974年10月，他成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IACF）的总干事，这个机构聚集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50年，当时名为文化自由大会（CCF）。据伯格罕研究，这个组织致力于打赢两场文化战争：“一场是针对苏联阵营的战争，这是一场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反共产主义战争的组成部分；另一场是针对那些关于美国的根深蒂固的消极观念的战争，它们存在于西欧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资产阶级心目中，他们拒不承认美国是一种文明和一个社会。”^②但是，由于该组织在一段时间里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心理战存在着一些瓜葛。1966年，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一事被曝光，到处是愤怒的指责之声。^③结果，第二年，文化自由大会的总部从华盛顿迁到巴黎，为远离此前争议的纠缠不清，

① Watson, *Limits of Independence*, p. xv. 沃森被派往古巴，因为他是少有的既能流利操说西班牙语又能娴熟使用俄语的官员之一。

② Volker R.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ii.

③ 关于这件丑闻的一项讨论，参见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pp. 220ff. 关于一项强有力的辩护，参见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自此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①

然而，在沃森同意出任总干事时，协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支持。在此前数年里，福特基金会是主要的资助来源，但它此时表示不想继续资助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因此，1977 年，沃森只得决定对协会进行关门清算。在此之前，大会和后来的协会曾经是拥有数百万美元巨资的机构，在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以及许多非亚拉国家都设立了代表处。它资助了超过十二份知识分子杂志和学术期刊，组织了研讨当代重要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 1950 年，文化自由大会的目标是调和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从而建立起反共主义的共识。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广泛批评，这种共识业已土崩瓦解。此外，福特基金会有志于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资金，它希望结束与这样一个未能成功地同那个有污点的文化自由大会一刀两断的机构之间的联系。伯格罕还进一步指出，在文化自由大会丑闻曝光之后，福特基金会愿意继续资助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与东西方关系并无多大的关系，而主要与巩固其自身形象有关，即美国至少在文化成就上是一个堪与欧洲相媲美的国家。^②

在国际文化自由协会行将就木之际，沃森的一大主要任务就是为协会的期刊和下属机构争取资助，而福特基金表示愿意资助其中一部分期刊和机构。毫无疑问，在这些下属机构中，最重要的是欧洲知识分子合作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成立于 1966 年，旨在使东欧地区那些并不那么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化，同时让苏联阵营的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得到世人的关注。吉尔霍特认为，基金会建立起“一个深入到东欧国家内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

① 吉尔斯·斯科特·史密斯并未把知识分子视作中央情报局的鹰犬，任由美国政府操控于股掌之间。他以葛兰西为例指出，共同价值观的存在使得美欧知识分子建立起与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军事、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纽带，从而形成一个针对苏联的、由大西洋主义者组成的霸权联盟。参见 Giles Scott-Smith, *The Politics of Apolitical Culture: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the CIA, and Post-War American Hegemony*,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p. 288.

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个网络，许多关于东西方关系、缓和以及文化趋势的观念纷纷宣告问世”。^① 在实践意义上，基金会旨在通过向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书籍和其他材料以推动文化对话，同时有助于让一部分西方人知晓基金会的活动。

基金会在成立之初与国际文化自由协会进行密切合作，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在财政上依赖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但它愈益急不可耐地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因而跟协会拉开了距离。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分道扬镳。例如，基金会的努力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文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东西方分裂，因此，它猛烈抨击缓和的提法，因为缓和旨在将东西方分裂持久化。同样地，基金会愈益卷入东欧地区正在兴起的新的社会运动。然而，在沃森执掌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大权之时，他意识到基金会正与那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而根据吉尔霍特研究，档案表明，沃森不断地为基金会辩护，并同意担任基金会主席。1977年，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宣告解散，基金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沃森辩解说，基金会的存留意味着“国际文化自由协会的传统得到延续”。^②

虽然沃森即将转入学术界，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基金会的联系。有那么一段时间，基金会的资助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但1981年9月，当时尚未饮誉全球的大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对基金会的工作产生了兴趣。这年10月，接替沃森担任主席的安妮特·拉伯雷告诉他，索罗斯表示每年提供七万美元不成问题，他还帮助他们从福特基金会那里争取到资助。这就保障了基金会得以继续运行，虽然基金会跟索罗斯所资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日益纠缠不清。开放社会研究所旨在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社会联盟，因此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基金会的

① See Nicolas Guilhot, “A Network of Influential Friendships: The Fondation Pour Une Entraide Intellectuelle Européenne and East-West Cultural Dialogue, 1957–1991”, *Minerva* 44(4), 2006, 379–409, p. 380.《智慧女神》是自由文化委员会最早创立的其中一份期刊。

② 引自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p. 350.